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生成路径及其世界历史意义

邓昌豫, 卜祥记

石河子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新疆 石河子 832003

摘要: 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整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生成路径包含至关重要的“两翼”: 它既是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又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结果。基于“一体两翼”的理论维度, 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分析既不能局限于国际交往的狭隘视域, 也不能忽视东西方文化的相互融通, 更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立场。应当看到, 一方面,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实际上包含有国际外交、国际经济、国际政治、国际生态、国际文化等几乎涵盖了人类生活全部领域的丰富思想内涵; 另一方面, 它既植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文化土壤, 又深刻展示出与西方文化的融通性, 蕴含着全人类共同文化价值观的深刻内涵。因此,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绝非处理当今世界难题的权宜之计, 而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理论创新, 是构建人类社会新形态和人类文明新类型的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和力量。

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体两翼; 中国传统文化; 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2186/2023.04.001

文章编号: 2096-9864(2023)04-0001-12

中共二十大报告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作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价值追求, 也作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价值目标, 同时还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并上升到“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高度^[1]。全面领会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创新及其世界历史意义, 要求我们既要从“一体两翼”的维度深入展示作为完整理论整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双重生成路径, 又要深入揭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内蕴的人类共同文化价值观: 只有在“一体两翼”生成路径的分析中, 才能深

刻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学理性和创新性; 只有在人类共同文化价值观的分析中, 才能深刻呈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现实性和历史必然性。

一、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在当代中国和 21 世纪的理论成果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秉承了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的唯物史观立场与方法, 是“真正的共同体”思想在 21 世纪的发展与创新; 同时,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也是马克思主义及其“真正的共同体”思想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收稿日期: 2023-05-05

作者简介: 邓昌豫(1978—), 男, 河南省项城市人, 石河子大学副教授, 博士, 硕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卜祥记(1963—), 男, 江苏省丰县人, 石河子大学绿洲学者, 博士, 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

1. 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在 21 世纪的发展与创新

在原则性高度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的唯物史观立场与方法在当代的运用、发展与创新,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国际背景下,针对 21 世纪“世界经济增长乏力,金融危机阴云不散,发展鸿沟日益突出,兵戎相见时有发生,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阴魂不散,恐怖主义、难民危机、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2]538}等人类共同面临的世界性困境,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2]537}的唯物史观思考,也是针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针对“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1]、对人类共同应对全球性难题、开创人类美好生活、掌控人类命运的热切呼唤、深情期待和哲学论证。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人类社会现实和全球性视野的三重维度上,揭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必然性及其现实可能性,是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在 21 世纪的理论成果。

“共同体”这一概念最初是描绘人类历史早期自发群居的生活状态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借用“共同体”概念,从唯物史观出发,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从宏观上划分为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自然共同体”、资本主义的“虚幻的共同体”和实现了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真正的共同体”三个时期。在论及“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时,马克思指出,“这种所有制像部落所有制和公社所有制一样,也是以一种共同体为基础的。但是作为直接进行生产的阶级而与这种共同体对立的,已经不是与古典古代的共同体相对立的奴隶,而是小农奴”^{[3]522}。在这一论述中,原始社会、奴隶社会

和封建社会实际上都被看作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自然共同体”。应当看到,尽管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的分离早在奴隶社会即在最初形式的国家形态中就已经出现,或者说国家本身就是特殊利益上升为虚幻的普遍利益的存在形式,尽管“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以便把自己的利益又说成是普遍的利益”^{[3]536-537},但是当马克思指出“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3]536}时,这里所说的“虚幻的共同体”主要指称的乃是资本主义社会,而它的虚幻性本质就在于资产阶级自觉地在意识形态层面系统化理论化地把自己的特殊利益说成是全社会的普遍利益。正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虚幻共同体性质,马克思才提出了“真正的共同体”概念,而这一概念所指称的本质就是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类社会新形态,即共产主义社会。实际上,在稍早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中,马克思就使用了“人的真正的共同体”概念:“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4]只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才更为清晰地揭示了“真正的共同体”的实质性内涵——“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3]571}这一论断的清晰性在于:它不仅把人的本质与人的自由本质性地相关联,而且依据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宏大理论叙事,论证了人的自由状态即“真正的共同体”的历史必然性与现实可能性,即资本主义的“虚幻的共同体”社会是自发分工、异化劳动和私有制发展的必然产物和现代形式,只要“消灭”了资本主义性质的(自发)“分工”“异化劳动”和“私有制”,由此生成的就是人类社会的“真正

的共同体”,即以自觉自愿的“社会分工”为基础的每个人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3]537}。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以这样一种“联合体”的概念赋予作为“真正的共同体”的共产主义社会以清晰的思想内涵,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53}。

因此,就马克思的“真正的共同体”而言,它与作为人类社会新形态的“共产主义社会”乃是同一序列的概念,是唯物史观立场和方法的集中体现和理论结晶。就此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以下四个方面体现出对“真正的共同体”思想的继承与创新:其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唯物史观核心立场和基本方法在21世纪的运用与发展。正如马克思曾经指出的那样,唯物史观“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同时,它也“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而且,也只有“在人们着手考察和整理资料——不管是有关过去时代的还是有关当代的资料——的时候,在实际阐述资料的时候,困难才开始出现”^{[3]526}。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及其内涵,正是运用唯物史观的核心立场和基本方法,“实际阐述资料”即实际地分析21世纪“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2]537}的理论结晶,是实际地分析“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的“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为“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的世界各国人民何去何从所提供的中国抉择,是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的集中体现,是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的伟大贡献^[1]。其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真正的共同体”思想在21世纪的具体

运用和最新理论成果。马克思曾经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3]527}他还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3]539}就此而言,共产主义或“真正的共同体”绝不只是单纯的目标或理想,它更是一场运动或一种事业,即在决定性揭示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与根本规律的理论前提下,依据社会现实的世界性新进展和面临的全球性新问题,提出的新的解决方案,积极有效地推动人类社会进步事业,共创人类美好生活。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正是共产主义或“真正的共同体”思想在21世纪的最新理论成果。其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的中国化表达和中国化创新,是“真正的共同体”与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有机融通,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元素和深厚的中国文化内涵,鲜明地体现出“一体两翼”的理论特质。换言之,作为最新理论成果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真正的共同体”思想的继承与创新,同时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其四,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同时还具有与西方文化的亲和力,因而具有强烈的文化感染力,更容易取得国际性共识。直接看来,马克思的“真正的共同体”或“共产主义”思想是西方历史文化的理论结晶,是基于唯物史观对西方历史上的“理想国”“乌托邦”“太阳城”以及作为其理论性表达的空想社会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社会思潮的继承与超越。实际上,理想社会和美好生活是不同时期不同民族的共同追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桃花源”“大同世界”也是世界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依托,以“和而不同”

“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等中国文化元素和中国文化理念诠释马克思的“真正的共同体”思想,不仅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且更为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世界化,彰显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世界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汇通,为摆脱21世纪人类困境和破解当代国际性难题,提供了可以达成广泛性共识的理论方案。

2. 马克思主义“真正的共同体”思想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世界进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始终把为人类求解放作为远大目标。纵观世界所有政党,没有一个政党拥有如此天下情怀和崇高理想。早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就确立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理想,并立足于世界性视野和人类情怀诠释何谓“社会主义”。1920年11月,在写给留法的湖南新民学会会友们的信中,毛泽东主张把“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会务方针,并指出“这种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6]。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内忧外患的困境下,中国共产党人依然秉持世界性视野与情怀,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指出:“我们要扩大团结的范围,把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全世界除了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以外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团结在一起。”^[7]在美苏争霸的不稳定历史时期,面对随时可能爆发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国共产党人坚决反对霸权主义,积极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引导国际关系健康发展方向中发挥了积极的国际影响。

改革开放后,面对新的国际形势和世界发展趋势,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做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的重大判断。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上真

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8]105}面对新的世界主题、国际形势和中国国情,抢抓历史发展机遇、韬光养晦谋发展成为我国国内外工作的基本方针。在国内工作方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激发经济活力,推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大幅增强国家经济实力,不断提升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在外交工作方面,把维护世界和平以营造稳定的外部发展环境作为外交工作的首要目标。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一个国家要取得真正的政治独立,必须努力摆脱贫困……在经济政策和对外政策上都要立足于自己的实际,不要给自己设置障碍,不要孤立于世界之外。根据中国的经验,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是不利的”^{[8]202};世界也需要中国,中国的发展本身就是对世界的巨大贡献,“中国的问题,也等于五分之一的世界问题。因为全世界有五十亿人口,中国就占十亿多。中国真正发展起来了,对朋友们的帮助也许会大一些”^[9]。

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严重阻碍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诉求,迫切需要建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倡导建立负责任的伙伴约束机制,即各国政府和人民应积极推动世界走向多极化,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尊重世界多样性,正确引导经济全球化,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10]。历史进入21世纪,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11]的倡议,向世界传递了中国渴望和平

发展、愿做负责任大国的意愿,展示了希望通过世界各国共同努力建设一个和平、繁荣、和谐世界的愿景。

从毛泽东的“三个世界”、邓小平的“世界两大主题”、江泽民的“国际新安全观”到胡锦涛的“和谐世界”,针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国情与世情,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面对不断变化的国际政治形势,努力探索符合实际的人类共同发展方案,不断走向广阔的世界政治经济文化舞台,在国际社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逆全球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日益盛行,冷战思维沉渣泛起,地区冲突和国际性安全事件频发,全球性生态危机和国际性贫困问题不断恶化,意识形态对抗日益加剧,发展中国家发展趋势和生存空间不断遭到西方发达国家的遏制和挤压,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功、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并且拥有强劲的未来发展潜力、巨大的未来发展空间和日益明朗的发展前景的新时代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再度申明“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实行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而且明确提出了新时代的中国方案,即“积极主动参与全球治理,构建互利合作格局,承担国际责任义务,扩大同各国利益汇合,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⁴⁶¹。同时,汲取中国传统文化智慧,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3]⁵⁴¹等方面系统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勾画出以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推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让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阳光普照世界”^[12]的人类美好愿景。中共二十大报告不仅从“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

发展”“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等方面系统总结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成果和丰富内涵,而且再次弘扬了“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中国传统文化智慧,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只有各国行天下之大道,和睦相处、合作共赢,繁荣才能持久,安全才有保障”;同时,系统总结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核心目标——“中国坚持对话协商,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推动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推动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1]。

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不仅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而且在人类摆脱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现代化模式、开辟新的发展道路、走向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征程中,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和国际外交领域,而且内含了国际经济、国际文明文化交流互鉴等广阔领域,具有普遍性的世界历史意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一百年来,我们党致力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致力于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天下为公,人间正道,这是我们党具有历史自信的最大底气,是我们党在中国执政并长期执政的历史自信,也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继续前进的历史自信。今天,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没有辜负历史和人民的选择”^[13]。今天,我们也完全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辜负世界人民对中国进步事业的支持和期待。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14]164}。中共二十大报告特别强调了“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的时代课题。“和而不同”“天人合一”“天下为公”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念不仅深深镌刻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中,而且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时代境域中依然具有鲜活的当代性意义。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汲取了“和而不同”“天人合一”“天下为公”等所蕴含的古代先贤治理观、生态观与价值观,既承载着中国传统“和合”文化的深厚思想底蕴,又基于新时代新背景新课题实现了对“和合”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构建国际新秩序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贡献了当代中国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智慧。

1. “和而不同”文化理念的创造性转化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生成具有鲜明的现实性和理论性指向。就其现实性指向而言,它直接针对着由西方霸权主义大国建立起来的不合理国际秩序。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建构公正合理的新型国际关系和政治经济新秩序。就其理论性指向而言,它直接针对着现有不合理国际秩序之上的零和思维和冷战思维。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旨在倡导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和平相处的新理念和 new 思维。同时,针对西方国家基于零和思维和冷战思维而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担忧,习近平总书记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方式,把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的“和而不同”理念升华为不仅具有当代性价值,同时也具有长远历史意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和 new 思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理念引领行动,方向决定出路。”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

样一个“整个世界都在思考的问题”,我们必须回答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我们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将到哪里去?”^{[2]537}这三个问题实际上都是发展理念问题。面对人类共同面临的世界性困境,我们必须确立新的发展方案。从本质上来讲,发展方案也是发展理念问题。对于这一发展理念,习近平总书记给出了中国的回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2]539}

作为一种新理念和 new 思维,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植根于“和而不同”的中国传统文化。“和而不同”是中华传统“和合”文化的核心理念。《论语·子路》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和而不同”既是一种经邦治国的世界观,也是一种经时济世的价值观,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基因。“和而不同”之“不同”,意味着对文化、宗教、政治制度等社会差异性的尊重与包容。“同而不和”之“同”,则意味着依靠绝对实力衍生绝对权威,以达到改变其他个体或国家实现利己控制或统治的目的。历史上,秦统一六国,书同文,车同轨,为中华大一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也正因为它奉行“同而不和”的治理理念,从而导致二世而亡。近现代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以霸权手段强迫他国接受所谓“普世价值”,致力于输出颜色革命,导致伊拉克、利比亚等国大量人民死于战火、难民流离失所、经济发展停滞不前,是所谓“同而不和”理念的现代西方表现形式。

在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所承载的新理念新内涵的具体阐释中,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沉浸于“和而不同”中国传统文化,反复彰显中国“和合”文化的深刻内涵及其现代思想魅力。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主席指出,“‘物之不齐,物之情

也。’和而不同是一切事物发生发展的规律”^[15];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5 年年会上发表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主席又提出,应该“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并照顾各方合理安全关切”^{[14]355};在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上,习近平主席仍强调,要“坚持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加强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加深相互理解和彼此认同”^[16]。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只有各国行天下之大道,和睦相处、合作共赢,繁荣才能持久,安全才有保障”,并真诚呼吁“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1]。如果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还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社会个体为人处世的人生理念和生存智慧,那么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则赋予它以更丰富的现代性内涵和更广阔的视域,是“和而不同”传统文化理念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前者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已经被赋予丰富的现代性内涵: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以及人与自然共生共存,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以及绿色低碳和清洁美丽的世界;就后者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已经被拓展到 21 世纪乃至未来世界建立公正国际秩序的宽广理论场域。

2. “天人合一”自然观的创新性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倡导的处理国际关系、破解全球治理难题和构建国际新秩序的基本准则,同时也是重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根本遵循,包含着人与自然共生共存、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重要内涵。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习近平主席明确把生态建设同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和文明交流联系在一起,作为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努力方向。同时,把国际社会密切合作、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清洁美丽世界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思想内涵,并基于东西方文化对比的理论视角,阐释了人与自然命运与共的中国传统自然观的文化优势,“我们应该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寻求永续发展之路”^{[2]544}。

工业化之所以在创造出前所未有财富的同时产生了难以弥补的生态创伤,其现实性根源在于奠基于工业文明之上的资本逻辑,而其理论根源乃是工业文明赖以据的工业主义自然观。这种自然观以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为前提,以人对自然的无限征服为核心,以科学技术为手段,以占有自然为目的。因此,尽管传统工业化实践创造了巨额财富,但同时也带来了严峻的生态危机。早在 1844 年,马克思就已经洞悉到工业主义自然观的本质及其会造成的生态后果,并原则性地阐明了一种全新自然观的本质及其可能性。在马克思看来,人对自然的工业主义态度不过是私有制本质的理论表达:“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所拥有的时候……才是我们的。”^{[3]189}因此,对工业主义自然观的超越首要地表现为“对私有财产的扬弃”。只有在扬弃私有财产的前提下,人才能摆脱私有财产的人格化而以真正人的方式与自然界发生关系,也只有以真正人的方式与自然界发生关系,人对世界的关系才是“人的关系”,而不再是动物性的占有和享受关系。在这里出现的乃是一种与工业主义自然观截然不同的新型自然观——“感性自然观”,其核心要义是人与自然界的感性对象性关系。在这种感性的对象性关系中,自然界不再是满足人类利己主义贪欲的手段,也不再是利己主义个人“存在的基础”和“现实的生活要素”,而是“人的自然存在”,是“自己人的存在”,或者更通俗地说,自然界

的存在就是人的存在,自然界就是人本身,就是一个对象性的人,即马克思所说的“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3]187}。可以说,马克思“感性自然观”的出场是人类自然观历史上的伟大变革。习近平总书记所阐释的以“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为文化根基的“生命共同体”概念,不仅精准把握住了马克思感性自然观的思想精粹,而且将其转换成了具有典型中国风格的中国语言和中国概念,从而清晰深刻地表达出生态自然观的核心要义。今天的世界已经普遍性意识到工业主义自然观以及奠基于其上的工业文明即将突破自然生活的界限,并将开始危及人类命运,“天人合一”和“道法自然”的中国生态智慧以及在此深厚文化土壤之上的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思想,必将具有普遍性的世界历史意义。

3. “天下为公”价值观的当代性阐释

就其最初理论表达而言,习近平总书记对“天下为公”价值观的当代性阐释是针对全球发展失衡难以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而展开的。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主席把资本回报和劳动力回报差距日益扩大、收入分配不平等和发展空间不平衡看作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和一些国家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并指出,为了解决当今世界经济增长、治理、发展模式存在的问题,就要树立人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意识,打造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2]480-481}。应当看到,自中共十八大正式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以来,2017年的这一阐释在以下方面具有标志性意义:其一,它把在中国取得巨大成功的普惠发展模式提升到国际社会层面,作为破解当今世界经济增长、治理和发展模式难题的基本方案,从而丰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内涵。这意味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绝不仅仅局限于国际外交和国际政治

领域,而是同时包含了国际社会必须团结一致,以新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共同解决收入分配不平等和发展空间不均衡的经济性内涵。其二,它直接呈现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中国文化渊源。就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就其作为中国化的概念表达和时代理论创新而言,它还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下为公”理念的深厚土壤。天下所有事物均为世人所共有,方可称为“大道”,而大道昌行,则为“天下大同”。“天下为公”与“天下大同”相辅相成,呈现出社会安宁、物质富裕、社会公平的大同世界,彰显出中国人对于公平正义的不懈追求,描绘出一幅中国人理想世界的美好愿景。如果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还局限于一国之君的经济治理理念,那么当习近平主席把它上升到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的高度时,它则意味着对中国传统文化智慧和思想精粹的当代性阐释、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获得全新的理论内涵,达到新的理论高度。在2021年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的特别致辞中,“天下为公”理念的当代性内涵获得了进一步展开。习近平主席坚定地指出,我们必须“解决好这个时代面临的四大课题”,即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摒弃意识形态偏见、克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鸿沟以及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17]。在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的演讲中,习近平主席不仅再度强调必须“反对一切形式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而且援引了与“天下为公”相贯通的中国传统经济价值观——“国之称富者,在乎丰民”,再度呈现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共同富裕”“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价值指向,倡导国际社会“顺应历史大势,致力于稳定国际秩序,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18]。

总之,习近平紧扣世界经济发展主题和发展难题,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努力彰显中国主流价值观之作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东方文化源流、悠久的历史智慧及其在当代中国和21世纪世界的重大现实意义,既在历史性维度上奠定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传统文化根基,又在现实性维度上提升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亲和力。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世界历史意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世界历史意义突出体现在它所内蕴的价值出发点、价值保障和价值取向,具体体现在价值出发点、价值保障和价值取向对于凝聚全球性共识、共同开辟世界发展新境界、共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普遍历史意义中。

1. 谋求共同发展是21世纪世界的核心课题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谋求共同发展是21世纪世界的核心课题,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价值出发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高度的人类命运与共为理论前提,依据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和人类社会“真正的共同体”的必然发展趋势,倡导国际社会本着“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国际交往准则,反对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凝聚最大共识,谋求共同发展,以建立一个富裕、高效、稳定、公平、清洁美丽的大同世界。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大公约数,实现共同富裕是全世界人民的殷切期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1]。然而,正如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以大量数据证实的那样,当前世界范围内的贫富两极分化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呈

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19]。《2021年全球多维贫困指数》报告也显示,在调查覆盖的处于多维贫困状态的人口中,有10亿人依然面临着缺乏基本卫生设施的问题,同时,还有10亿人的居住条件无法得到良好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全球发展失衡,难以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当今世界经济增长、治理、发展模式存在必须解决的问题。”^{[2]480}就造成世界范围内贫富两极分化的根源而言,虽然有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弱势群体自身的原因,但从历史和现实维度看,发达国家的财富积聚几乎普遍性地充斥着对欠发达国家地区的资源掠夺,而他们的既有竞争优势、不合理的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和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则持续扩大着世界发展差距。中共二十大报告既强调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又明确指出“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1]。就此而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谋求世界范围内的共同发展,鲜明地凸显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价值出发点,揭示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未来愿景。

2. 重塑共识体系是谋求共同发展的价值保障

谋求共同发展必须重塑共识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内含着重塑共识体系的价值内涵,为谋求共同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价值保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范围内共创人类美好生活的伟大事业,必须确立全人类的共同发展理念和共同价值观。以人类共同发展理念和共同价值观为核心的全球共识体系,既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保障,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

应有之义。

习近平的大量论述系统阐释了人类的发展理念和共同价值观。就共同发展理念来看,它旨在塑造与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截然不同的新发展理念,倡导平衡发展、公平发展、协同发展、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发展机会均等、发展成果共享。就共同价值观来看,它旨在塑造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冷战思维、零和博弈、以邻为壑、双重标准等截然不同的新人类共同价值观,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天下为公的全人类共同文化价值,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坚持亲诚惠容、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友好互信和利益融合,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尤其是自资本主义虚假的“普世价值观”在世界范围内占据话语霸权以来,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蕴含的全人类共同发展理念和共同价值观不仅在重构国际话语体系的思想进程中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在东西方文化价值观的融通中凝聚了最大公约数和最广泛的思想共识,同时也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价值保障。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

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价值取向,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非只是在当下国际交往领域中处理不同国家地区关系的权宜之计,它具有更为广泛的内涵和更为深刻的意义。只有立足于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宏大视野,立足于现代性发育和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性嬗变,立足于人类文明样态的历史演进,我们才能深刻领会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世界历史意义。

迄今为止,人类已经历经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开始迈入生态文明的新时代。在文明发展史的维度上,以资本逻辑和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工业文明突破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而且它在不到一百年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5]35-36}。但与此同时,工业文明也割裂了自然生活和社会生活。就自然生活而言,资本的牟利性本性和无限制的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地把自然界设定为被资本和技术所“座架”的“质料”、被价值所通约的“生产资料”、被人类中心主义所预设的客体、被狭隘利己主义所量度的满足人类贪欲的手段和工具,从而造成了人与自然界日益加剧的对抗,而这种对抗几近达到突破自然界自我调节限度的程度。就社会生活而言,资本的牟利性本性和无限制的经济增长不仅以劳动和资本、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阶级对抗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为基础,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和财富占有的两极分化,而且随着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扩张和以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单边主义为手段的不合理国际分工体系的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对抗与财富分化日益国际化,几近达到突破社会自我调节限度的程度。

早在资本主义时代之初,在充分肯定其历史必然性和历史进步性的同时,马克思就已经敏锐地洞悉到工业文明将带来的弊端。一方面,就如何摆脱自然生活的弊端而言,马克思不仅把消灭资本逻辑作为根本路径,而且在自然观的理论层面即在人和自然界关系的层面上,以哲学话语的方式本质性地建构起与工业主义自然观截然不同的“感性自然观”,即人和自然界是“感性对象性关系”的理论模型。此后,尤其是20世纪以来,伴随着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

和人类生态意识的觉醒,诞生了以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和《我们共同的未来》为代表的绿色运动、以《寂静的春天》为代表的生态文学、以《敬畏生命》为代表的生态伦理学、以《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和自然》和《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为代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为代表的有机马克思主义等一系列社会运动和理论思潮。但是,从总体上看,在开辟生态文明新形态并为之奠定坚实的自然观基础方面,这些思潮都没有到达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和“感性自然观”或“生态自然观”的理论高度。当习近平主席创造性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并指出人和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时,他就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式继承并发扬了马克思“感性自然观”或“生态自然观”思想,为走向人类文明新样态奠定了坚实的自然观理论基石。另一方面,就如何摆脱社会生活的弊端而言,马克思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阐释和以《资本论》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它同时也是对资本主义运行机制、内在矛盾及其必然历史命运的批判性分析,深刻揭示了超越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历史必然性、现实可能性及其根本路径,科学地论证了作为“真正的共同体”的“共产主义”之社会文明样态乃是人类必然的宿命。此后,以萨特、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存在主义、以卢卡奇及其理论继承者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现代社会批判思潮,成为现代西方学术思想的主流。但是,正如海德格尔在对萨特的评价中指出的那样,实际上包括海德格尔本人在内的几乎全部西方学者都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不懂得“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

越”^[20]。所谓“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乃是马克思基于对资本主义异化劳动批判所开启的人类走向新文明样态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可能性。当习近平主席创造性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时,他不仅真正领悟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而且基于对21世纪世界资本主义新形态、新矛盾、新问题、新症结的深刻剖析,基于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理论总结和理论突破,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把马克思主义“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现实性地转化为当代理论形态,在新的现实基础和新的理论高度上规划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承载的一种人类新文明的可能性以及走向新文明样态的现实性路径与方案。这种新文明样态包含作为基本构成的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以及在此基础上所生成的政治生态、文化生态等。其中,任何一种生态的达成都是一项世界性的事业,是人类命运与共的事业,是求同存异、合作共赢、协同发展、共享发展的事业,是共同打造人类美好生活、开启人类新时代的事业。习近平总书记中共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中国人民愿同世界人民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既对中国人民也对世界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2022-10-26(01).
- [2]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 [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4]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94.
- [5]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74.
-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38.
- [8]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9] 冷溶,汪作玲.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240—1241.
- [10] 江泽民. 江泽民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473—475.
- [11] 胡锦涛. 与时俱进 继往开来 构筑亚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亚非峰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05-04-23(01).
- [12]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392.
- [13]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持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 增加历史自信增进团结统一增强斗争精神[N]. 人民日报,2021-12-29(01).
- [14]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 [15] 习近平. 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4-09-25(02).
- [16]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461.
- [17] 习近平. 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N]. 人民日报,2021-01-26(02).
- [18] 习近平. 坚定信心 勇毅前行 共创后疫情时代美好世界[N]. 人民日报,2022-01-18(02).
- [19] 皮凯蒂. 21世纪资本论[M]. 巴曙松,陈剑,余江,等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485.
- [20] 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选集:上[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383.

[责任编辑:毛丽娜 武威]



引用格式:邓昌豫,卜祥记.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生成路径及其世界历史意义[J].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4(4):1—12.